“思想就是我的战斗”

——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战争书写

焦红乐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亲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创伤深刻烙印在她的思想与艺术表达中。她不仅通过《雅各的房间》《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等作品，以象征、意象与隐晦的叙述技巧再现战争的残酷性，消解战争神话，批判战争对社会与个体的毁灭性影响。同时，她还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超然”战争观，主张以“超然”的态度和女性的和平力量对抗战争的暴力与男性中心的统治逻辑。伍尔夫的战争书写不仅是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也表达了其对和平、自由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战争书写；“超然”战争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5-0090-09

收稿日期：2025-07-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博士后科研项目（202103028）：弗吉尼亚·伍尔夫现代主义创作与古希腊文学传统研究。

作者简介：焦红乐（1990-），女，河南平顶山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5.002

作为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蝉蜕而出，率先进行英国现代小说实验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一直以来都因其创作中的实验性和革新性而备受推崇。尤其是她对“精神主义”的强调和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学界普遍认为她“是所有英国作家中最内向的小说家”①，是“一位细腻优雅的文体家，对传统上被称为‘政治’的东西的兴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②，从而忽视了她作品中极具现实张力的战争书写维度。这不仅使得伍尔夫被简化为一个逃避政治的美学家，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作为重要战争叙述者的身份。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并结合对伍尔夫日记、书信、传记和小说作品的重新研读，本文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构成了伍尔夫生命的创伤性背景，更催生了其文学实践中独特的战争哲学。正如马克·赫西（Mark Hussey）指出的那样，战争在伍尔夫的一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且她对战争的反应是强烈且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③因此，本文基于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的双向观照，通过对伍尔夫的战争创伤记忆、战争话语解构和哲学思想超越这三重维度的辩证分析，探讨伍尔夫如何基于战争创伤经历，以独特的文学策略解构传统战争叙事，并建立基于女性经验的“超然”战争观。

一、伍尔夫的战争记忆与创伤

创伤（trauma）最初是一个严格的医学术语，特指生理上的伤害，但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创伤的含义逐渐扩展，涵盖了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伤害。埃里克森（Kai Erikson）指出，创伤既可以来自一系列的人生经历，也可以来自一次突然的恐惧事件。④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她的战争创伤正源于其作为战争亲历者的深切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与大多数民众一样，伍尔夫

①Michael North, *Reading 1922: A Return to the Scene of the Moder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1.

②③Mark Hussey, *Virginia Woolf and War: Fiction, Reality and Myth*,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 p. 14.

④Kai T. Erikson,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American Imago*, vol. 48, no. 4 (Winter 1991), pp. 455-472.

内心虽稍感不安，却始终难以接受战争的真实性，并觉得“有人会受到伤害，那看上去是完全不可能的”①。在写给姐姐文尼莎的信中，她甚至以轻松的语气谈论日常琐事，如房租问题，而对战争的评论也显得颇为平静：“我们发现和平仍然存在——除了一条新闻报道说英国已经参战之外。”②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升级，伍尔夫逐渐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记录相关消息。她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伦纳德的两个弟弟——菲利普和塞西尔，他们在参军后前来探望时，带来了关于前线战斗和军队生活的谈话内容。

1915 年 4 月 23 日，好友鲁珀特·布鲁克在希腊战场阵亡的消息，第一次让伍尔夫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她在日记中写道：“任何时候的无助感都不会比布鲁克之死导致的这种情绪更为沮丧。”③对此，凯伦·莱文巴克（Karen L Levenback）指出，“鲁珀特·布鲁克之死标志着伍尔夫对战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④ 布鲁克是伍尔夫自幼相识的挚友，战争爆发后他以海军军官的身份参战，却在希腊东部爱琴海的一场战役中不幸阵亡。布鲁克死后，因其留下的战争诗歌而声名大噪。政府当局为鼓舞士气，将他神化为具有古希腊勇士气质的高贵英雄，丘吉尔更称其为“英格兰的高贵的儿子”。然而，伍尔夫在痛惜布鲁克英年早逝的同时，对这种国家主导的战争宣传深感愤慨。⑤ 当布鲁克的朋友爱德华·马什为纪念他而编纂《鲁珀特·布鲁克诗集，附回忆录》（*The Collected Poems of Rupert Brooke, with a Memoir*）并邀请伍尔夫撰写评论时，她向凯·考克斯抱怨道：

> 当我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大声说出我所知道的关于鲁珀特的事情是完全令人反感的……我认为这是我读过的最令人讨厌的回忆录（当然，这有点言过其实！）。他设法把鲁珀特的信写得和他自己对鲁珀特的描述一样肤浅和做作。⑥

在布鲁克之后，伦纳德的弟弟塞西尔与菲利普接连伤亡的消息再次冲击了伍尔夫。她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星期六，我们听说塞西尔死了，菲利普受了伤。”⑦有评论家认为，伍尔夫对塞西尔之死的反应显得冷漠，仅以一句话记录，而她对布鲁克的死也极少提及。然而，凯伦·莱文巴克认为，这种叙事风格与诺斯克里夫前线的死亡报道颇为相似，因为当时的伍尔夫正“贪婪地”阅读大量报纸。对此，笔者认为，这种简洁的表达方式恰恰反映了伍尔夫对死亡的拒绝——她不愿通过书写赋予死亡某种真实性。亲友在战争中的相继离世，让伍尔夫深刻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个体的脆弱。尤其是当伦纳德也面临被征召入伍的风险时，伍尔夫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死亡的可能性似乎不再遥不可及。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面对从战争到和平的突然转变，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了内心的困惑与思考：“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得很好，表示对和平方面感到满意……每个人心里都有同样的

---

①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915—1919,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 32.

②Virginia Woolf,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2: 1912—1922, Edit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p. 50.

③Mark Hussey, *Virginia Woolf and War: Fiction, Reality and Myth*,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4.

④Karen L. Levenback, *Virginia Woolf and the Great War*,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

⑤正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宣传之下，人们对战争形成了普遍的乐观心理，在战争最初的八个星期里英国就有志愿从军者七十五万，接下来的八个月又增加了一百万，而这些走上战场的男性，大多是身穿戎装的市民和年轻知识分子。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380 页。而据 Kenneth O. Morgan 提供的研究资料：从八月开战到 1914 年年底，英国共有 16200 官兵阵亡，47707 人受伤，16746 人失踪或被俘。47 位贵族头衔继承人命赴黄泉，其中很多人名列伊顿公学 150 名丧生战场毕业生名单，这个数目占这个学校整个战争期间最终丧生总人数的 15%。这些伤亡数据在英国人眼中十分可怕，而要跟其他交战国伤亡人数比起来就是小数目了。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有了征兵制，截止到停战的时候，英国共有 6 百万人穿上了军装，占英国成年男性人口总数的 1/4，其中参战人数的 1/8 有去无回。参见 Kenneth O. Morgan, cited in Max Hastings, *Catastrophe* 1914: *Europe goes to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 548.

⑥Virginia Woolf,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2: 1912—1922, Edit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pp. 267-268.

⑦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915—1919,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 83.

不安和无法安定下来的感觉，对一切可能的事情都感到不满。”[①]而在写给姐姐文尼莎的信中，她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无法释怀的复杂情绪：“我虽然情绪激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激动？），但我也感到非常忧郁……当然也有一种死亡之床的气氛。”[②]战争虽然结束，但人们对战争的反应和态度却令伍尔夫深感失望。停战协定签署仅一个月后，伍尔夫便敏锐地察觉到“战争几乎已经被遗忘了”[③]。

一战结束仅十余年后，二战的苗头逐渐显现，伍尔夫再次意识到战争噩梦的临近，内心的忧虑愈发深重。她在给好友奥托琳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公共事务部门不要抬起他们丑陋的头。当我晚上因为思考政治而无法入睡时，事情一定是一团糟。”[④]随着局势的恶化，伍尔夫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并积极参与反战组织和集会。与许多和平主义者一样，她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然而，她的丈夫伦纳德和外甥朱利安·贝尔却持有不同立场。朱利安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在于阶级与经济的变化，文明必须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手段来抵御其侵扰。在他看来，反战等同于向法西斯主义屈服，而反法西斯则意味着必须进行备战。因此，1937 年 6 月，刚从中国返回伦敦的朱利安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奔赴西班牙战场，不久后便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对于这位挚爱外甥的离世，伍尔夫感到震惊与悲痛。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一个如此年轻且尚未充分绽放的生命竟会如此突然地凋零。在与伦纳德的朋友 W. A. 罗伯逊讨论朱利安的行为时，伍尔夫痛心地说道：“有一种伟大……它偶尔以某种方式安慰着一个人。只是看到她不得不忍受的东西，我怀疑是否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事值这个价儿。”[⑤]朱利安的死深深触动了伍尔夫，并成为她在《三个基尼》中对战争进行深刻批判的重要动力。世界局势的动荡与朱利安的离世使伍尔夫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

据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伍尔夫和伦纳德便开始讨论如何赴死。从日记来看，1940 年 5 月到 6 月整整两个月，伍尔夫都在思考自杀的时机与方法。她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德国入侵英国，身为犹太知识分子的伦纳德和他的小说家妻子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纳粹的残酷迫害。在她看来，“战争是一场令人绝望的疾病”[⑥]，她看不到任何未来，并几乎坚信战争会输。她绝望地写道：“我无法想象还会有一个 1941 年 6 月 27 日。”[⑦]1940 年，伍尔夫在僧侣屋创作《幕间》时，不列颠之战在苏塞克斯的上空打响，战争第一次近距离地、真实地出现在她面前。在整个 7 月到 8 月的日记中，她详细记录了令人惊恐的空袭场景。在写给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书信中，她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终日里，飞机不断在房上掠过，每天都有不幸的难民上门求援。”[⑧]随着空袭和轰炸的日益频繁，她曾居住和工作了 15 年的塔维斯托克广场 52 号也被夷为了平地，当看到曾经工作的地方沦为废墟时，“伍尔夫反而生出了一种奇怪的解脱感，似乎无处可逃的厄运终于降临，来了个彻底的了断”。[⑨]

在战火弥漫的岁月里，伍尔夫饱受战争摧残，她试图通过写作转移注意力，然而面对法西斯力量的强大与暴虐，即便是最心爱的写作也无法抚慰她内心的巨大创伤。她在日记中写道：“写作很困难。没有观

---

①③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915—1919,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p. 216-217, p. 227.

②Virginia Woolf,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2: 1912—1922*, Edit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p. 290.

④Virginia Woolf,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1932—1935, Edit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p. 428.

⑤[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419 页。

⑥⑦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1936—1941,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p. 285, p. 299.

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1936—1941,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p. 299.

⑧杨静远：《弗·伍尔夫致凌叔华的六封信》，《外国文学研究》1989 年第 3 期，第 11 页。

⑨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 183 页。

众。没有私人的刺激，只有外部的咆哮。”[①]1941年初，伍尔夫被深不见底的绝望情绪所侵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在3月28日，不堪精神重负的她选择投河自尽。从一战期间亲友的伤亡，到二战期间爱侄朱利安的离世以及家国的破败，伍尔夫经历了战争所带来的所有伤痛与折磨。这些创伤不仅加剧了她的精神疾病，更导致了她的精神幻灭，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结局。因此，战争与伍尔夫的生命历程紧密交织，成为她生命中无法磨灭的伤痛，同时也成为她时刻关注并贯穿其创作的核心主题。

二、消解战争神话：伍尔夫的反英雄主义叙事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战争早已成为伍尔夫生命中的潜流，深深埋藏于她的记忆深处，持续影响她的生活与思考方式。正如凯鲁斯所言：“（创伤）不是简单地座落在某个人过去的暴力或原初事件中，而是存在于其非比寻常的不可（为意识）吸收的本质上——这种方式在第一次遭遇中是不可理解的——（它）返回并追逐幸存者。”[②]因此，伍尔夫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将战争所引发的敏锐感受与深刻体验转化为文字，通过作家对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的独特把握，艺术化地再现了战争带给英国民众乃至全人类的毁灭性灾难与精神创伤。

在传统战争叙事中，战争往往被塑造成一场宏大而崇高的史诗。英雄主义、国家荣誉与牺牲精神成为叙事的核心，战场被呈现为男性气概的终极试炼场，胜利与失败则以清晰的边界被划分。这一叙事模式倾向于将战争简化为一套符号系统——勇敢无畏的士兵、慷慨激昂的演讲、壮烈牺牲的瞬间，而战争的残酷本质、平民的苦难以及战后的精神创伤则被刻意淡化或浪漫化。这种叙事还往往通过文学、艺术和纪念碑等文化形式将战争神话渗透进集体记忆，塑造出“必要的牺牲”等统治性意识形态。正如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言：“能够创造集体情感和普遍观念，并且能够予以维持，是统治艺术的前提。”[③]因此，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对决，还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战争美学，都隐含着一种将暴力神圣化的修辞策略，最终使得战争不仅被接受，甚至被期待成为一种解决争端的手段。伍尔夫则并未像传统反战小说那样直接描绘战争场景，塑造英雄主义人物，而是另辟蹊径，避开了那种刻板的政治性集体记忆书写，转而以艺术化的、反英雄主义的叙事手法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

在《雅各的房间》中，伍尔夫就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象征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种内敛而深刻的反英雄主义叙事，使该作品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中关于战争与创伤的独特书写。对此，学者凯瑟琳·沃尔亦认为这部作品是“试图创造一种重要的美学形式来体现战后悲伤体验的现代主义挽歌的实验”[④]。具而言之，在作品中，伍尔夫首先通过“骷髅”“骨头”和“墓地”等一系列死亡意象，为整部小说笼罩了一层哀伤、凄凉与不安的基调。如雅各在海滩边捡拾到的羊颌骨、女仆丽贝卡在厨房捉到的骷髅蛾、草地上散落的小骨头、杜兰太太“薄得像一块漂白的骨头”的鹰钩鼻、约克郡荒原上的“罗马骷髅”、雅各伦敦住所门上雕刻的公羊头骨、雅各母亲常带孩子们去的墓地等等，这些意象无不萦绕着死亡的气息。通过这些细节，伍尔夫将英格兰描绘成一个巨大的藏骨棺，腐朽、衰败与死亡的气息弥漫其间，甚至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雅各母亲所感受到的那样，“儿子的声音和钟声同时发出，将生与死难以分开地、令人振奋地夹杂在一起”[⑤]。这种生死交织的氛围，不仅象征着战争年代的生命脆弱与社会动荡，更隐含着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与集体恐

---

①Virginia Woolf,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6: 1936—1941, Edited by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p. 479.

②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

③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称霸世界2：战争篇》，肖如燕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④Kathleen Wall, “Significant Form in Jacob’s Room: Ekphrasis and the Elegy”,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 44, no. 3 (Fall 2002), p. 303.

⑤弗吉尼亚·伍尔夫：《雅各布之屋》，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慌。尤其是雅各捡到的羊颌骨，这一意象不仅令其母亲“心底深处始终感觉到有种埋藏着的不安”①，还与小说结尾雅各门上的公羊头骨形成呼应，暗示了雅各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通过对这些意象的精心编织，伍尔夫将战争对个体的摧毁与对社会的摧残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伍尔夫在《雅各的房间》中还运用了一系列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意象，以此暗示并烘托出弥漫全书的战争氛围。如她将伦敦的灯光描绘为“宛如燃烧的刺刀尖托起黑暗”②，绿色的座钟则“由倚在长矛上、象征英国的女神守护着”③，而议会大厦则被比喻为“像拴在一起的灰色舰队”④。这些鲜明的战争意象不仅揭示了英格兰始终处于一种隐性的战争状态，也为小说注入了浓厚的时代氛围与历史隐喻。更进一步来讲，伍尔夫将主人公雅各·弗兰德斯的命运与战争紧密相连。伍厚恺指出，雅各的姓“弗兰德斯”直接指向一战中的著名战场“弗兰德斯”，而作为一战阵亡将士纪念日象征物的红色罂粟花也多次出现在雅各的希腊文辞典中，这些细节无不暗示着雅各作为战争牺牲品的悲剧命运。⑤此外，小说中还充斥着威灵顿公爵和英国海军上将威尔逊等战争的幽灵，博纳米被描述为一个“长着威灵顿式鼻子的年轻人”⑥，而雅各则多次被形容为“像一个英国的海军上将”⑦。这些形象不仅强化了战争的象征意义，也揭示了战争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在作品中，手枪声、大炮声、游行抗议的呼啸声和震荡声等声音意象不时出现，进一步渲染了战争的阴影。尤其是最后一章中抗议游行经过白厅的场景，被学者大卫·布拉德肖解读为“它就像是西方前线的炮火被重新指向了权力的核心”⑧。这一场景不仅展现了战争对社会的持续冲击，也揭示了权力结构与战争之间的深层联系。通过以上碎片化的意象和象征，伍尔夫将战争记忆与感受融入作品之中，他虽没正面描写战争，但却使读者置身于战争的阴霾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伍尔夫还将好友鲁珀特·布鲁克的记忆与雅各的形象相融合，使雅各成为因战争而毁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从而消解战争神话。如前所述，鲁珀特是毕业于剑桥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却在政府狭隘的爱国主义影响下加入英国海军，不幸战亡。伍尔夫对这种年轻生命的无谓牺牲深感痛惜，因此在塑造雅各这一形象时，她并未直接描写其参与战争的经过，而是将重点聚焦于雅各战前的生活。通过以雅各缺席的虚位空间为载体，借助众多旁人的记忆与叙事视角，伍尔夫多维度地展现了雅各生命的价值与潜能，从而透过人类文明历史的视野从侧面重新审视战争，揭示战争的罪恶。

在小说中，伍尔夫以大量篇幅描述了雅各在剑桥和伦敦的寓所、以及大英博物馆中阅读和讨论柏拉图、莎士比亚等文、史、哲经典名著的情景，记录了他游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遗址时对古典文明的探求与反思，以及他在与不同女性的交往中体验爱情与欲望、思考人生意义的历程。按照此种人生轨迹，雅各本应成为他理想中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但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使这位潜在的创造者尚未释放其生命能量便沦为牺牲品。通过对雅各人生价值的刻画，伍尔夫意在揭示，雅各与鲁珀特一样，都是在幻想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错误地将古希腊精神中的自由、勇敢与冒险精神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在第十二章中，当雅各沉浸在罗马和希腊古典文化的魅力中时，突然插入一段关于战争如何剥夺年轻战士生命的描写。这一突转不仅凸显了文明与战争的尖锐对比，同时也预示了雅各的命运——他终将与那些风华正茂却沉默无言的年轻人一样，被战争的机械性野蛮力量所扼杀。这一命运与小说结尾“黑暗像刀刃一样降落在希腊上空”⑨形成强烈呼应，进一步强化了战争对生命与文明的摧毁，批判了教育体系下对英雄主义的鼓吹。

此外，雅各的哥哥阿切尔加入了皇家海军，好友蒂米·杜兰特任职于海军部，而母亲的朋友巴富特上尉“脚有点跛，左手缺两个手指，他为国效力”⑩，这些细节暗示着战争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直接冲击。在传统教育体系的塑造下，这些本应成为社会栋梁的青年却沦为“锡做的玩具士兵”。以雅各为代表的青年智识

---

①②③④⑥⑦弗吉尼亚·伍尔夫：《雅各布之屋》，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6页，第126页，第136页，第230页，第205页，第231页。

⑤伍厚恺：《存在的瞬间——弗吉尼亚·伍尔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0-161页。

⑧Susan Sellers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0.

⑨⑩弗吉尼亚·伍尔夫：《雅各布之屋》，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第25页。

分子，正是在统治中心所建构的虚假“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集体情感与观念中，被驯化为战争的牺牲品，使得他们本该绽放的青春在硝烟中黯然消逝。由此，通过将好友鲁珀特·布鲁克的战争记忆融入雅各的艺术形象，伍尔夫不仅重新审视了战争的荒谬性，还深刻揭露了战争宣传的虚伪本质，并对帝国主义教育体制的阴谋进行了犀利批判，由此解构了英雄主义战争观。雅各的悲剧命运，不仅是对鲁珀特·布鲁克等战争牺牲者的哀悼，更是对战争对人类文明与生命价值毁灭性影响的深刻控诉。

在揭露和控诉战争给年轻生命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同时，伍尔夫还通过对另一类“锡做的玩具士兵”——那些幸免于死的战争幸存者——的刻画，深刻再现了战争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持续侵蚀。在《达洛卫夫人》中，她透过赛普蒂默斯这位在战后因疯狂而自杀的年轻人形象，再次揭示了战争给人造成的深重而持续的精神创伤。从相关资料可考，赛普蒂默斯这一形象中含有菲利普的影子，而他在战场上死亡的好友埃文斯则影射了菲利普的兄弟塞西尔。1915 年在法国战场上，菲利普和塞西尔被同一颗炸弹击中，塞西尔当场阵亡，菲利普虽幸免于难，却终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从未从塞西尔之死中恢复过来”①。1917 年，伍尔夫和伦纳德探望康复中的菲利普后，她在日记中痛心地写道：“我可以想象他因自己缺乏感受力而感到困惑……一种毫无用处的感觉弥漫在空中，把这些人打垮，又把他们修补好……”②菲利普的沉默、阴郁以及对战争经历的刻意回避，使伍尔夫敏锐地意识到战争以及战争中逝者在幸存者内心投下的沉重阴影，这些感受被完整地投射到赛普蒂默斯的形象之中。伍尔夫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菲利普：“也许菲利普觉得自己多少有点碍事，但毫无疑问，他现在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是个旁观者。很孤独。”③而这段描述恰与作品中不仅被恐惧笼罩，还因好友的死而深陷负罪感，丧失了感知生活的能力，时常感到孤独、厌世，仿佛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的赛普蒂默斯形象相呼应。通过对赛普蒂默斯战后一系列精神创伤的描写，伍尔夫揭示了战争对人类尊严、价值乃至生存权利的剥夺与毁灭。在她看来，战争作为一种现实和对生命的威胁从未真正“结束”，它只是被冠以其他名义，例如“重建”。

事实上，与雅各一样，赛普蒂默斯同样是政府狭隘“爱国主义”宣传下的牺牲品。在英雄主义教育的鼓动下，赛普蒂默斯曾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为莎士比亚而拯救英格兰，但是以布拉德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其所实施的迫害，却暴露了统治者不仅视年轻生命如草芥，而且还无情压榨和剥削这些战争的幸存者。统治者从战争和社会体制中获取利益，而像赛普蒂默斯这样的底层阶级却只能驯顺地接受统治，成为其敛财的工具和牺牲品。通过对赛普蒂默斯这一战争孑遗者的刻画，伍尔夫再次消解了英雄主义战争观，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本质，并批判了那个通过对战争正义性与荣耀性的宣传，诱使有志青年自愿走向战场，使其沦为战争发动者替罪羊的社会体制。她的笔触不仅指向战争对个体的摧残，更深入剖析了战争背后权力结构的虚伪与罪恶，从而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三、“超然”战争观：“冷漠”与“温情”的双重面向

战争的惨绝人寰是伍尔夫无法逃避的悲苦现实，然而正如林德尔·戈登指出的，“她的本能反应却是抗议而不是绝望”，“抗议的声音……似乎在我们心中培养起了快乐和战斗的本能，而不是受苦和理解”④。这种抗议精神在 1940 年的日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伍尔夫以“战斗者”的姿态写下了“思想就是我的战斗”⑤的名言。事实上，早在 1938 年，伍尔夫便发表了她用女权主义思想批判二战时期民族国家战争暴力的经典政论性随笔《三个基尼》。在文中，她首次将女权主义与反战宣言结合起来，从教育、职业和文化

---

①Leonard Woolf, *Beginning Again: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11—1918,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2, p. 182.

②③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915—1919,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 92, p. 248.

④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84 页。

⑤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5: 1936—1941,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p. 285.

等层面消解了战争的神话，揭露战争动机的同时，又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将家庭中的男权主义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正是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衍生出的统治心理，在延展到公共领域后导致了战争的频繁爆发。

在伍尔夫看来，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压榨心理，与战争中的暴力与专制心理如出一辙，换言之，战争的本质正是进攻性男性思维主导的结果。鉴于此，伍尔夫提出了一种“超然”（“indifference”）的战争观，呼吁女性成为超然的、不受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观影响的政治主体。“超然”战争观基于伍尔夫对性别本质和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其核心理念包含三重维度：在认识论层面，她认为女性因性别天性，缺乏“男子汉性格”等战争心理机制，与战争本质存在根本性差异，应当避免陷入战争话语的裹挟；在政治立场上，强调女性需以批判性视角审视被剥夺教育权、财产权等历史遭遇塑造的“爱国主义”，通过理性分析而非情感冲动确立国家认同；在实践层面则提出具体行动，抵制军事展览等战争文化展演，在私人领域消解战争狂热，即“不要煽动她们的兄弟作战，也不要劝阻他们，而是要采取完全超然的态度”①，继而通过经济独立与思想自主构建不依附于父权战争体系的生存方式。②因此，这种“超然”绝非消极回避，而是一种能够控制愤怒的情感态度，是对男性主导的战争逻辑及其价值观的彻底漠视和拒斥，是以性别经验为基点的另类和平主义实践。正如她在《三个基尼》中所说：“帮助你们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不是重复你们的说法，仿效你们的做法，而是找到新说法，发明新方法。我们帮助你们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不是加入你们的社团，而是待在你们的社团之外配合它的目标。”③

正是这种“超然”的哲学立场深刻塑造了伍尔夫独特的战争书写范式，使其小说在主题表现和艺术手法上都与吉卜林、海明威等男性作家笔下的战争叙事形成鲜明分野。在《雅各的房间》与《达洛卫夫人》中，她通过战争对年轻生命的摧毁这一视角切入对战争本质的哲学叩问；而在《到灯塔去》与《岁月》等后期作品中，她进一步突破了战争记忆的具象化书写，将创作重心转向更具思想深度的命题，即人类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战争。这种创作演变过程，恰恰印证了其“超然”战争观的渐进深化。在后期创作中，伍尔夫有意摒弃戏剧性的战场描写，转而采取含蓄节制的叙事策略。正如她在随笔中所言：“当别人采取漠然态度听任他们自由行动时，人往往比别人把他们的行为作为感情兴奋的中心时更不易采取行动。”④对此，传记家哈里斯认为，伍尔夫采用的留白与克制的战争书写策略，实则暗含深刻的美学考量，通过制造叙事的疏离感，迫使读者与战争保持必要的反思距离。这种对战争的一笔带过和轻描淡写，恰恰“使战争给人一种不真实、遥远的印象。然而这种遥远只会使震惊与生命渺小的感觉更加深刻强烈”⑤。

在《到灯塔去》第二部分“岁月流逝”中，伍尔夫仅用寥寥篇幅便将十年战争的黑暗与残酷一笔带过，使时空的距离变得微不足道，从而暗示战争笼罩下生命的渺小和事物的瞬息万变。在该部分中，她通过括号简略交代了安德鲁在战争中的死亡，以极简的文字暗示了战争对年轻生命的无情剥夺。随后，她又通过海滨别墅往昔的热闹场景与今日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的对比，隐晦地传达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深远破坏。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之前的草稿，伍尔夫在最终版本中有意删去了一战的详细描述。战争暴力的破坏性，在“岁月流逝”的草稿中，以及在比巴黎期刊《商业》上发表的版本早一年出版的另一个版本中，都更为明确。⑥可见，在最终版本中，伍尔夫仅仅通过括号内容和简单的战争氛围烘托来呈现战争的暴力介入，显然是有意淡化甚至消除对战争的公开提及。对此，莉斯尔·奥尔森认为：“这一节的括号可能确实突出而不是转移了里面所描述的令人震惊的事件。”⑦通过这种简单化、隐晦的艺术表现形式，伍尔夫表达了在永恒的时间和生命面前，个人的生死、人间的悲欢，甚至人类历史长河中看似最英武雄壮的重大事件——战争，都

---

①②③④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 III》，王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138 页，第 1138-1145 页，第 1183 页，第 1142 页。

⑤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 69 页。

⑥James M. Haule, “To the Lighthouse and the Great War: The Evidence of Virginia Woolf's Revisions of ‘Time Passes’”, In Mark Hussey (ed.), *Virginia Woolf and War*,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64-179.

⑦Liesl M. Olson, “Virginia Woolf's ‘Cotton Wool of Daily Life’”,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26, no. 2 (Winter 2003), p. 61.

是渺小、虚无且无足轻重的，充分表达了其对战争的讽刺与批判。在伍尔夫的艺术世界中，战争不再仅仅是具体的暴力冲突，而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片段。她通过对战争的后撤式书写，不仅揭示了战争的荒谬与虚无，同时也质疑和动摇了男性中心的战争逻辑的合法性，表达了其对和平与人类文明的深切期许。这种独特的战争观，使其作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对战争与人性永恒反思的经典之作。

同样，在《岁月》中，伍尔夫也将战争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中，通过人物在寻常琐碎中的回忆、感受或是谈话来简单地折射出人们战前的惶惑不安，战时的惊扰和恐慌以及战后的幻灭等情绪。这种间接而克制的手法不仅弱化了战争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地位，也使得战争记忆以更加细腻而深刻的方式得以再现。在“一九一七年”之前的章节中，伍尔夫通过帕吉特太太的疾病与死亡、帕吉特上校的虚伪与欺骗、女儿盼望母亲早些死去的反常心理、迪格比家小女儿萨拉身体的残疾等细节，勾勒出战前世界阴郁压抑的生活氛围。这些看似平凡的家庭琐事，实则映射出战争前夕社会整体的焦虑与不安。而在“一九一七年”一章中，则以简洁而有力的笔触，描绘了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伦敦在战争阴霾下的混乱场景：警报器的悲鸣声、空袭的军号声、沉闷的爆炸声、大炮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骚乱、暴力、恐慌和死亡弥漫在伦敦城上空。这一章节的高潮是埃莉诺和萨拉、玛吉、勒尼以及尼古拉斯一起吃饭时，因空袭而惊慌失措地躲进地下室的场景。这一细节生动地展现了战争阴霾下人们内心的恐慌、无助与不安，也揭示了战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伍尔夫的日记中称，在创作这一章时，“为了唤起对战争的记忆，我读了一些旧日记……一遍又一遍”①，她决定让这些回忆“酝酿”得更久一些，从而在审美控制和虚构变形之间建立必要的距离。埃莉诺在萨拉家遭遇的空袭场景，正是伍尔夫在空袭之夜躲在地下室的记忆再现。1918 年 1 月 3 日的日记记录了她与伦纳德、凯·考克斯以及鲍勃在地下室中躲避空袭的画面。② 通过对实行灯火管制后的浓浓夜色的描写，对挤在地下室躲避空袭时无助、惊恐、害怕等情绪的刻画，以及对一个原本正常有序的世界因战争而变得面目全非时的恐惧感和陌生感的呈现，伍尔夫不仅再现了个人的战争记忆，同时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公众经历的记录。在当晚空袭结束时，尼古拉斯曾提议为战后的新世界干杯，表达了对和平与未来的期许。然而，到了 1937 年的家庭聚会中，这一场景再次出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1917 年时他们所期待的战后“新世界”不仅没有到来，反而又一次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作为战后新一代代表的佩吉不禁自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快乐’呢？每个街头的每一张海报上都是死亡，或者更有甚者——专制；残暴；折磨；文明的没落；自由的终结。我们在这里，她想，只不过靠一片叶子庇护，它也难逃毁灭的厄运。”③佩吉的困惑与绝望，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摧毁，以及战后一代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至此，伍尔夫致力于从自身遭遇和内在体验出发，以不落他人窠臼的独特方式将战争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淡化战争的直接描写，将其转化为一种隐晦而深刻的背景音，既展现了战争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也表达了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批判，同时也为反思战争提供了另类的诠释法则与叙事方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所展现的“超然”态度绝非是冷酷无情的疏离，而是一种蕴含人道主义关怀的深刻批判。这种表面看似淡漠的叙事姿态，实则是作家对战争本质最富温情的反抗，她一方面揭示了主流战争话语的暴力本质，另一方面则试图构建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和平伦理。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对战争普遍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达洛卫夫人》中的克拉丽莎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这一切总算过去了，感谢上帝——结束了”④；而在《到灯塔去》中的莉丽眼中，战争似乎并不存在；《幕间》中拉特鲁布女士在其露天历史剧中更是有意忽略对英国军队、国旗及战争等的表现，表达了对传统历史观念中战争这一“重大事件”的不屑与疏离。但这种对战争的“冷漠”并非简单的逃避主义，而是伍尔夫对男性主导的战争逻辑

---

①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4: 1931—1935,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p. 193.

②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1: 1915—1919, Edited by Anne Olivier Be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p. 93-94.

③弗吉尼亚·伍尔夫：《岁月》，蒲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39 页。

④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第 2 页。

的深刻反思与拒斥。她始终坚信女性具有和平与抚慰的特质，并希望通过女性的力量拯救被战争撕裂的人类社会。在她的文学世界中，女性角色往往成为战争阴影下的精神庇护者，她们通过细腻的情感联结与审美化的生命态度，为被战争异化的现代心灵提供救赎的可能。

在《达洛卫夫人》中，克拉丽莎通过对生活的敏锐感受与热爱、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对身边人的同情与关爱，为周围的人们带去了抚慰与欢乐。当赛普蒂默斯在创伤记忆中分崩离析，正是克拉丽莎举办的晚宴像磁石般将离散的个体重新吸附之时，她以沙龙女主人的身份创造着临时性的情感共同体，用香槟杯碰撞的清脆声响消解着战壕记忆的阴郁回响。在《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则被赋予更丰厚的象征维度，她调节餐桌氛围的直觉智慧，安抚詹姆斯童年创伤的温柔力量，乃至在“时光流逝”章节中那座随她逝世而荒芜的别墅，无不暗示着女性作为情感枢纽的重要功能。莉丽也是在拉姆齐夫人爱的感召下，重新燃起对艺术的信心，并通过对生命本质的追寻，最终实现了与拉姆齐和塔斯莱等男性的和解。而在《幕间》里，拉特鲁布女士将这种救赎努力推向更宏大的层面，她坚持不懈地创造新的艺术文明，试图通过艺术的力量将离散的人群重新聚集，营造一种和谐的共同体氛围。

结　语

伍尔夫的战争书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选择，更是一种女性主义立场的体现。她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战争与父权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战争的“超然”再现，呼吁一种基于和平与人性尊严的新价值体系。她的战争书写不仅是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更是对和平、自由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通过对战争记忆的个体化表达、对传统战争叙事的解构以及对“超然”战争观的艺术实践，伍尔夫展现了战争书写的双重面向：既是对战争暴力的批判，也是对女性力量与乌托邦理想的热切呼唤。她的创作不仅丰富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形式，也为理解战争与性别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Thinking is My Fighting”
——on Virginia Woolf’s War Writing

JIAO Hong-l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 master of modernist fiction, Virginia Woolf lived through both World Wars, and the trauma of war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her thought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works such as *Jacob’s Room*, *Mrs. Dalloway*, and *To the Lighthouse*, she employed symbolism, imagery, and elliptical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represent the brutality of war, dismantle its mythologies, and critique its devastating impact on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Simultaneously,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he articulated a concept of “detachment” from war, advocating for the pacifist power of women as a counterforce to the violence and patriarchal logic of warfare. Woolf’s war writing i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war but also an expression of her deep concern for peace, freedom, and the fate of humanity.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war writing; “indifference” view of war

[责任编辑　唐音]